

经济前沿学术札记

道德 公正与效率集

经济转轨与 社会公正

金雁 秦晖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JINGJIQIANYANXUESHULIZHAIJINGJIQIANYANXUESHULIZHAI

JINGJIQIANYANXUESHUSHAZHAI

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金雁 秦晖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金雁,秦晖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2

(经济前沿学术札记)

ISBN 7-215-05038-6

I. 经… II. ①金…②秦… III. 经济体制改革—
—对比研究—独联体、东欧 IV. F15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44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9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00 元

金 雁

1981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苏东史学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东欧、俄罗斯的历史与现代问题研究。

秦 晖

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起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4年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发展部研究员，筹建农民学研究所。199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经济前沿学术札记

道德 公正与效率集

经济前沿学术札记

道德 公正与效率集

茅于軾

《道德 经济 制度》

姚 洋

《自由 公正和制度变迁》

金雁 秦晖

《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纪坡民

《自由与道德》

责任编辑：张素秋 王 豪

责任校对：岳秀霞

技术编辑：胡颖君 薛正强

封面绘图：孟 煌

设计制作：北京世纪太平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目 录

- 1/ 告别叶利钦时代
——俄罗斯转轨进程回顾
- 41/ “分”之罪？不“分”之罪？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 65/ 起点平等的产权改革模式
——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一
- 76/ 持续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
——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二
- 94/ 从“捷克奇迹”到“捷克陷阱”
——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三
- 107/ 捷克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四
- 122/ 产权改革与工人参与
——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
联合企业改造的案例分析
- 139/ 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论匈牙利转轨之一
- 163/ “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论匈牙利转轨之二

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181/ 热话题与冷思考

——关于社会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的对话

217/ 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

240/ 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

——与张曙光先生商榷

249/ 拒绝“原始积累”

257/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

告别叶利钦时代

——俄罗斯转轨进程回顾

千禧新年前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辞职。这位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大选刚刚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时自愿下台，不仅结束了人们关于他是否会老马恋栈的猜测，而且增加了他中意的接班人当选继任的可能，对自己为之奋斗过的事业乃至自家的善后达成了现有条件下最有利的安排。此举可以说是他在民主游戏规则下取得的最后一次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成功，也为他两年来麻烦不断的政务画上了一个难得的句号。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改革明星”，从他1988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党派被逐出政治局起，已经11年了。从1991年8·19事变后他实际主宰俄罗斯政局、同年年底苏联解体最终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而开创了叶利钦时代起，也已经8年有余。他曾经辉煌过，但更多的却是坎坷。无论是好是坏，他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任后人评说。无论是褒是贬，他无疑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功是俄罗斯的选择，他的失败也很难说只是一己之罪孽。如今他以病夫之躯，在国内问题成堆、声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尽头。虽然他的下台仍然堪称光彩，但告别讲话中的叶利钦还是向俄罗斯人民道歉说，他没能实现他们的期望，把一

个繁荣的俄罗斯带入新世纪。不管怎样，“叶利钦时代”已经落幕，是做总结的时候了。

破旧有方，立新乏术

做总结就有个价值基点的问题。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作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不谈“姓资姓社”，只说他在瓦解着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毕竟现在连俄共也指出：叶利钦不仅没有给俄罗斯人带来西方式的生活，也没有给俄罗斯人带来西方式的制度——无论是西方式的规范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换言之，在叶利钦的政敌看来，叶利钦最糟糕的一点是能破旧而不能立新，而叶利钦的拥护者则认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见叶利钦在“立新”上干得如何是评价他的关键。至于这“新”姓社姓资，至少在大部分俄罗斯人看来并不重要。另外，苏联解体不仅是一种制度的解体，也是一个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大家庭”）的解体，原来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种秩序下重新调整“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建一种关系格局，在这方面叶利钦的成就又如何？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罗斯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罗斯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而且也比大多数

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实现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不上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近8年，俄罗斯并没有形成像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展，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罗斯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至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也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来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苏联的波罗的海地区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来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表明俄罗斯人还远未学会民主

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于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制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俄罗斯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奇里斯马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罗斯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大体是对的。

二

“帝国后遗症”

当然，说“立新”无术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立新”，否则在旧秩序不复存在时又完全没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乱了。俄罗斯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从未能避免这种悖论：一方面消除混乱是维持帝国、实行强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强力本身不但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致乱因素，以至于没有一个

帝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乱,恢复旧帝国也往往是永无可能。于是“帝国后遗症”的结局多数都不外乎三者:第一种结局是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旧式强力更严酷的强力控制。这种“乱世铁腕”可以在混乱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体制的解体,乱糟糟的“魏玛共和”维持了15年,终于使德国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绪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选上了台,并拥戴他建立了法西斯专制的第三帝国。与此同时“魏玛现象”遍及全欧,一战以来帝制解体后新生的许多共和国也纷纷抛弃“混乱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变方式产生了铁腕专制,如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整顿”)政体与匈牙利的霍尔蒂独裁。俄国在沙俄倾覆后出现的“二月民主”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执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无术失去民心,在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上几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张“人民专制”的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大获全胜。可以想见,即使布尔什维克不因大选失利而驱散议会,“二月民主”也极可能演变为铁腕专制,只是专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第二种结局是帝国解体后的混乱发展为内战,而内战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绝大多数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内战中的胜者建立新的铁腕控制,其最终结果与前述第一种结局一样,只是经过内战代价更大罢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从我国历史不断重复的“分久必合,乱极生治”的王朝循环,直到1917年后的俄罗斯内战、1911年后的中国内战。或者在内战中无胜者,帝国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渐成为一盘散沙,最终不仅原先的“大国”不复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后冷战时代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从阿富汗、扎伊尔、南斯拉夫、索马里直到最近苏哈托垮台后的印尼——后者虽未发生全面的内战,但从东帝汶、亚齐之变直

到各主要城市频频发生的暴力骚乱，也比前述那种“混乱的和平”无序得多了。至于历史上，从强力控制解体走向统一国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脱于这种命运的反而是少数（中国在“治乱循环”中一直延续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罗马帝国解体后那样走向长期混乱乃至文明变异的却是世界历史上的“常规”。

第三种结局是外部输入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从而摆脱“专制的稳定”与“混乱的民主”之循环，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德、日二战后在被占领状态下的民主化，二战后的西德没有步魏玛共和国的后尘，原因固然很多，二战后德国受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改造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但这种状况要蒙受被占领的耻辱，除非出现非常条件（战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对于“帝国后遗症”有几点须指出：

第一，强力控制帝国的后遗症并不是某种“主义”所特有的。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强力控制，由于过分地垄断社会组织资源，都可能导致社会缺乏替代组织能力，从而造成强力消失后的无序，出现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俄罗斯的“乱”被一些人指责为放弃了某种主义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某种“主义”要为如今的“乱”负责。其实，苏联解体后产生的这些现象，与苏哈托专制崩溃后印尼的混乱、1917年沙俄崩溃、1911年清王朝垮台后的混乱十分类似。它与帝国的意识形态无关。同时，乱中出现的新铁腕也非某种主义所特有，德国“魏玛共和”之后出现极右的纳粹专制，俄国“二月民主”之后出现极左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体制产生于左翼——社会党，而匈牙利的霍尔蒂体制产生于右翼——箭十字党，但结束“混乱民主”，建立比旧体制更严酷的强权则是其共同点。

第二，这种后遗症也非某种“文化”所独有的。儒教的中国、东正教的俄罗斯、天主教的匈牙利与新教的德国都出现过这种现象，

而且不但像中、俄这样专制帝国历史悠久的国家出现过,经历过启蒙运动深度洗礼并久已实行立宪制度的德国出现过,甚至在中世纪就长期具有“贵族民主”、“自由选王”等非专制传统的波兰也出现过萨纳齐专制这样的现象。当然,传统可能使人更能适应某种体制,但造成帝国后遗症的一些基本因果关系(组织资源垄断与无序状态的互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预并非这种后遗症的基本原因。有些国家如后蒙博托时代的刚果(金)、后殖民时代的安哥拉出现乱世,固然与外因有关,但大多数国家,如西亚德之后的索马里、门格斯图之后的埃塞俄比亚、苏军撤走后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乱因素都主要是内因。在有些场合外来干预反有助于稳定,如国际社会的监督对南非过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无论外因是促进稳定还是生乱,都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

第四,“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但真想回到昔日的可能几乎没有。我国民国初期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苏联、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也莫不如此。混乱中产生新强权、更严厉的强权是很可能的,但恢复旧式强权则罕有其例。

三

走出“魏玛化”阴影

从应付“帝国后遗症”的角度看,应当说叶利钦时代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历史积怨至深的各族之国,俄罗斯人又只占苏联人口的不到一半,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危机之积累也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在八年中能使俄罗斯基本保持稳定,苏联和平解体、俄罗斯境内除车臣等边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

漫长的过渡期中俄罗斯既没有由混乱发生内战，也没有导致人们因厌乱而走向极端，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俄罗斯的“魏玛化”危险或重蹈1917年“二月民主”覆辙之可能，但俄罗斯人民近来反而出现了日益“中派”化的趋势：1998年以来各方的民意调查显示左右两翼（俄共与叶利钦身边一群人所代表的寡头自由派）影响下降，极左极右（安皮洛夫式的“斯大林主义者”与日里诺夫斯基式的法西斯倾向）更不成气候，而以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中左翼和以“亚博卢”为代表的中右翼则地位上升，这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后遗症”事例中是极少见的，而对于传统上向来好走极端、中派从未成事的俄罗斯来说就近乎奇迹了。尤其在1998年出现金融危机、叶利钦本人的行事又日益病态、社会不满加剧的情况下就更是奇中之奇了。无疑，在社会心态“中派化”的情况下出现“左”或“右”的新铁腕、重演“魏玛共和”或“二月民主”悲剧性结局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叶利钦自己要想“铁腕”——在民主化进程中叶利钦的成就就在于连他自己也极难能扭转这一进程了。

俄罗斯没有乱出内战，没有乱出极端化，当然更没有落到请外国人来“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行驶。

这样的局面，要说叶利钦“只破不立”是不对的，他“立新”无术，但毕竟还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罗斯没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与有效的权力制衡，但毕竟已经有了公认的议会与总统选举，有了强大而合法的反对派，有了“可以反对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与公民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只准拥护的政府”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行俄宪法赋予叶利钦的权力虽然在民主国家看来几乎相当于“新沙皇”，但这毕竟是在与

反对派竞选中产生的“民选沙皇”。在他的统治下，民选议会固然没有多大权力，但绝非橡皮图章。它成己之事虽则不足，败叶之事则有余。8年来叶利钦的意图在民主程序面前碰壁的事不知凡几：从宪法法院的裁决、“十月事件”被捕者的重获自由并重返政治舞台、总理提名的被否定、“官办两党制”的失败，直到他无法选择继承人。当今俄罗斯政治上最受抨击的莫过于炮打白宫与政治暗杀。但这两件事是典型的“民主制下的反民主罪行”，它一方面表明如今俄罗斯民主的脆弱，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主的存在。而在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岂能有抗命的白宫和非暗杀不足以制服的政敌出现？

有人说，斯大林时代对反对派是从肉体上消灭（外加株连九族），赫鲁晓夫则是从政治上批臭（如对马林科夫等），勃列日涅夫是悄然地组织处理（如对谢列平等），戈尔巴乔夫时代则能将其排挤出官方体制，却不能阻止其在体制外发展（如对叶利钦），而完善的民主制下一个领导人是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任意把谁排挤出官场的。在这一点上，叶利钦并没有比戈尔巴乔夫前进多少，但他也没有后退多少。他与戈氏一样可以把异议者赶出官场，却不能阻止其通过体制外途径再“回来”。平心而论，今日俄罗斯的民主与自由已不是有无的问题，而只是多少的问题。这样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戈尔巴乔夫奠定的，叶利钦不是“俄罗斯民主”的创立者，而只是守成者。然而多少“帝国后遗症”的事例告诉我们，这个守成也绝非易事。

俄罗斯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更严重，经济转型比政治转型更困难，这不仅与中国比，而且与中东欧诸国比也是如此。因此叶利钦政权在经济问题上比政治问题上更被动，也不全是他的“错误”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存在着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西方国家更大比例的灰色经济，因此正式统计中反映的经济总量下降与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明显是高估了的。这也可以